

文白对照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十石齋



輯覽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文白对照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第十八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九 (6189)
 (起甲戌唐德宗贞元十年 讫壬辰唐宪宗元和七年)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六十 (6335)
 (起癸巳唐宪宗元和八年 讫丙午唐敬宗宝历二年)
-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六十一 (6481)
 (起丁未唐文宗太和元年 讫丙寅唐武宗会昌六年)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五十九

(起甲戌唐德宗贞元十年 讫壬辰唐宪宗元和七年)

唐

德宗皇帝

甲戌 贞元十年，春正月，云南击吐蕃，大破之，遣使来献捷。

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诣云南。佐时至，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异牟寻令佐时衣牂牁（注见前）服而入，佐时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失色，献款受诏，佐时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

唐

德宗皇帝

甲戌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春正月，云南王异牟寻袭击吐蕃大获全胜，派使者到朝廷进献捷报。

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奉诏赴云南。崔佐时到达云南时，吐蕃的数百名使者已先期到达云南国。异牟寻不想让吐蕃人知道自己已归附唐朝，他让崔佐时身穿牂牁人的服装进见，崔佐时说：“我堂堂大唐使者，岂能穿小小夷人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只好在夜里迎见崔佐时。一见面，崔佐时就向异牟寻郑重宣读了

者，去其所立之号，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与佐时盟于点苍山（在今大理府太和县西，滇载记，山高千余仞，有峰十九，苍翠如玉，蒙氏封为中岳）神祠（在山中峰之麓）。先是，吐蕃征兵于云南，异牟寻许发五千人与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异牟寻自将数万人踵其后袭击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遣使献捷。已而异牟寻复遣其弟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诏以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为册使，立异牟寻为南诏王。（诏赐银窠金印，异牟寻北面跪受，因与使者宴，出元宗所赐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袁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大唐诏书，异牟寻听罢诏书惊慌失色，抽抽咽咽地接受了诏书。崔佐时乘机劝说异牟寻，让他把吐蕃使者全部杀死，并取消吐蕃自立的国号，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全都听从照办了，并与崔佐时在点苍山（在今大理府太和县西，据当地资料记载，此山高千余仞，有大小山峰约十九座，山色苍翠如玉，被蒙氏封为中岳）神祠（位于中峰脚下）订立盟约。在此之前，吐蕃曾向云南征调援兵，异牟寻答应派五千兵马相助。此时正好以这五千兵马为先行，异牟寻亲率数万人紧随其后袭击吐蕃，结果大获全胜，夺取吐蕃城池十六座，俘虏大王五个，吐蕃士兵十余万降滇。云南王于是派使者前来报捷，不久异牟寻又派其弟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及吐蕃所赠的金印，并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德宗皇帝下诏，任命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为册封南诏的使臣，立异牟寻为南诏王。（德宗下诏赐南诏王以银作底的金印，异牟寻北面跪拜后接受了金印，接着大摆宴席宴请使者，席间拿出玄宗所赐器物给袁滋看，还指着一年迈的吹笛者和一个歌女说：“当年皇

帝赏赐《龟兹乐》时带来的乐班，现在就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了。”袁滋说：“南诏应当缅怀先辈事迹，子子孙孙为唐朝尽忠。”异牟寻说：“下臣岂敢不恭受使者的教导。”）

夏六月，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感方士之言，饵丹二万余丸，不食而死），其子緘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己。都虞侯王延贵（字君佐，汝州梁人）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延贵。守进至，谓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緘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緘掌事，诸君意何如？”众莫对，緘乃发丧。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緘赴东都，寻以延贵为节度使，赐名虔休。

夏六月，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

李抱真去世（抱真被方士之言所迷惑，吃仙丹两万余丸，最后绝食而死），其子殿中侍御使李緘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之于众，伪造其父表章，请求将昭义节度使之职授予自己。都虞侯王延贵（字君佐，汝州梁地人）素以忠义勇敢闻名于世。皇上知道李抱真已经不在人世，便派中使第五守进前往观察动静，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对李緘说：“朝廷知道李相公已不在人世，已经让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緘听了非常惊恐，出来对众位将领说：“朝廷不许我接替父亲掌管军事，众位意下如何？”众将不语。李緘只得将父亲死讯公之于众。接着第五守进又召见王延贵，向他宣读了皇上的诏令，命他代理昭

冬十二月，陆贄罢为太子宾客。

裴延龄恣为诡譎，处之无疑。（上欲修神龙寺，延龄奏：“同州一谷有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又奏，简阅左藏，于粪土中得银十三万两杂货百万有余，请入杂库以供别支。太府少卿韦少华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之，物请加推验。”不许。）上亦颇知延龄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群臣畏其有宠，莫敢言，陆贄独以身当之，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斂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培克斂怨为匪躬，以请谗服谄为尽节，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

义事情，并催促李絳速回东都府第。不久，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节度使，并赐他新名为虔休。

冬十二月，陆贄被罢为太子宾客。

裴延龄任意宣扬诡诞之事，并把它说得让人无可怀疑。（皇上要修神龙寺，裴延龄上奏说：“同州的一个山谷中有数千株巨树，那些树全都高达八十尺。”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都附近征集好木材尚且没能找到，今天怎会有这么多？”裴延龄答道：“上天造出珍贵的木材，本来就是为了等明君圣主出世后才会让它出现，开元、天宝时期怎么会有呢？”裴延龄又上奏说，他曾在检阅国库时，从废物中清理出十三万两白银及杂货百万余件，请求纳入杂库以供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同意此说法，上表直言，声称：“那些财物每月都是上报过的，请求皇帝详加查验。”德宗未允。）德宗也深知裴延龄好为怪诞之事，只不过因为他经常议论别人是非，希望通过他来了解民间的事情，所以才亲近他。群臣因畏惧裴延龄是皇帝的宠臣，都不敢

少卯。迹其奸蠹日长月滋，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美余。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赵憬之入相也，贄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事见前），密以贄所讥弹延龄事告之。延龄益得以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贄。贄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遂罢贄为太子宾客。（贄为相，尝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匱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未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可谓措置乖方矣。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罪以隐忍而不彰，

妄言其过，惟有陆贄挺身而出，与他针锋相对，上书痛陈裴延龄的邪恶诡诈，历数其罪恶行径。（陆贄上书大略是说：“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作为长远的方策，以诡诞妄为当作善谋，以苛剥民财、招惹怨恨者为舍己尽忠，以谗言媚主者为忠贞不仁，真可称为是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的邪恶害政行为，每日每月都在滋长，拆东补西，却变成了他的政绩，取此挪彼，就成了他进贡的税款。当年赵高指鹿为马，鹿马皆动物，尚有相同之处，怎能比得上裴延龄指有为无，指无为有呢？臣以卑鄙之躯，担当宰相重任，实在是责任重大，情不自禁，只好知无不言呀。”）德宗看了奏书大为不悦，不仅没有归咎裴延龄，反而对他更好了。说起赵憬当宰相，实际上也是陆贄引见的。后来赵憬与陆贄有了矛盾，赵憬便将陆贄弹劾讥讽裴延龄的事偷偷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更得以施展他的诡计，陷害陆贄。后来德宗就开始相信裴延龄，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认为陆贄正直了。陆贄曾与赵憬相约，二人共同在德宗面前历数裴延龄的奸邪，德

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愤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可谓课责亏度矣。虜每入寇，将帅虚张威势，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边，閭井日耗，征求日繁，可谓财匱于兵众矣。夫兵以气势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自顷分割朔方，列为三使，其余镇军，数且四十，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可谓力分子将多矣。理戎之要在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穷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而常有冻馁之色；关东戍卒，怯于应敌，而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隶神策，其于廩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可谓怨生于不均矣。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戎虜驰突迅如风飈，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

宗听后当时便怒形于色，赵憬见状立刻不说话了，陆贄却仍慷慨依旧，就这样，陆贄被罢为太子宾客。（陆贄当宰相时，曾经上书论证边疆防务的六大失误，他认为：边防布置不当，赏罚不明而亏损法度，兵力过剩导致财力溃乏，将帅过多导致军事力量过于分散，分配不均导致怨恨四起，指挥人员远离战场指挥不力导致坐失良机。关东战士们水土不服，身受边疆荒野之苦，害怕外族军队的进攻，以至有的人乘王军溃败之时向东溃逃，也有人放弃城镇，动摇人心。这不仅于安全无益，反而是有害的，这难道不是布置不当吗？至于下级官员权力日益扩大，朝廷难以控制他们，将帅的号令在军中得不到执行，国家的法令对将帅也不再具有威慑力，有罪之人由于上级的过于容忍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有功之人却因为被人怀疑而得不到应得的奖赏，致使舍身报国的人却受到同辈的讥笑，率领士卒奋勇争先抢占城池的人反而遭到士兵们的怨恨，败军之将、卖国之人丝毫不感到羞愧畏惧，故意拖延救援、耽误军机的人却自以为聪明过人，这难道不

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将帅幸于总制在朝不尤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臣谓宜罢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多开屯田，官为收余，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又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之元帅，缘边诸镇，有非要者，随便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用，心甚重之。上性猜忌，官无大小，必自选用，一经谴责，终身不收，好以辨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赞又谏曰：“登进以愚庸，黜退以惩过，二者选用，理如循环，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飭以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

是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吗？每当外族入侵时，三军将帅总是虚张声势，夸大军情，其实只是为了趁机征收兵力，扩大各自势力，对国家防务毫无益处，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国库收入的一半都要用于边防开支，赋税日益增加，百姓不堪重负，这难道不是由于兵多而导致财力溃乏吗？军队以气势二字为重，士气旺盛则力量强大，士气低落则力量薄弱，大家团结一致，则可无往而不胜，大家各怀所想则一事无成，所以将北方之地分为朔方、河西、陇右三部分，以三个节度使掌管，其余各军镇，为数也有四十，对这些军队既无军法约束，只是以客礼对待，这难道不是将帅过多而导致军事力量分散吗？治理军队，在于审核军队的优劣，并以此作为划分队衣食粮饷发放等级的标准，使有才干的将士能够得到应得的好处，而无能之辈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但目前现状是，穷苦边陲的镇兵，都曾历经百战之苦，终年艰苦抗敌，流血流汗，却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关东守军畏首畏尾，不敢应敌，他们的军资粮饷却比那些边陲守军要丰厚数

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犹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则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矣。”上不听。赞又奏请均节财赋，凡六条。其一论两税之弊，略曰：“旧制租庸调法，天下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兵兴以来，版图隳坏，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不得其要。遽更旧法，以为两税，但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定数。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穡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

倍。更有甚者，有些人本来并非侍卫皇宫的禁军，而且身在京外，却能隶属神策军籍，他们得到的赏赐供应也比关东守军要多三倍。这难道不是分配不均导致怨恨四起吗？边防部队行动常常由皇上亲自决定，外族入侵突袭迅速，而从边防送来的战报却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送到，守边将帅有的以兵力众寡悬殊为借口不敢迎战，乡镇军队以没有接到诏令而不肯出兵。等到敌军劫掠一空撤退之后，却纷纷跑来争功祝捷。一旦战败，将帅们又都暗自庆幸政令出自皇帝，即使归咎也不必担心罪及自身；陛下本人又认为大权在自己手里，政由己出，自然也就不再追究。这难道不是由于遥远指挥导致坐失良机吗？臣认为应该废除各道将士转番秋防的制度，各道只供给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士兵以及土蕃和汉族子弟，号召他们多多开垦农田，收成由国家收购。这样侵略者来时全民皆兵，随时可以拿起武器上战场，农忙时节又可各自务农，自食其力。与此同时，还可以选拔勇武或有才学的人分别担任陇右、朔方、河东三路的元帅，管理

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飭励重其役，不以竊怠竭其庸，则功力勤。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雕残。”其二，请两税以布帛为额，略曰：“谷帛者人之所为，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两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缣帛布帛，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以钱谷定税，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买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

边疆诸镇，那些无关紧要的兵力布置，完全可以就近合并，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财物的贪污和浪费，从而也就可以制定划分衣物粮饷的分配等级制度，使军心民心顺服，体现公平的用人之道，使将帅士兵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公开提倡赏罚制度并依照它来考察将士们的成败得失。这样一来，臣以为必定可以使侵略者望而却步，而边境自然也就安然无事了。”对陆贽的上书，德宗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但却从内心里更加器重陆贽了。德宗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在用人上，不论官大官小，他都要亲自挑选，所用的人一旦犯了错误受到谴责，以后就终身不会再被起用。德宗又好以言辞口才取人，因此身边难得有诚实厚道之人。陆贽为此又上书说：“提拔晋升是为了勉励有功之臣，罢免官员是为了惩罚过失，奖惩并用，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被罢免的官员能够自我约束，将功补过，以求官复原职，又使被提拔的人再接再厉，不断进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被提拔者为人所信服，被罢免者毫无怨言。”陆贽还说：“圣明的皇帝不会以是否擅

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体至公之意。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遁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惟安居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请详定考绩，若管内阜殷，税额有余，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法，亦如之。”其四，论税限迫切，略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请为占田倭限，裁灭租价。事皆不行，贲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或规其太锐，贲曰：“吾上

长辞令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也不会以是否投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提拔人才的准则。如果喜好一个人的善行，就不加选择予以任用，或喜欢一个人的言语而不去验证他的行为；进退凭自己的好恶，任免看是否与自己的志趣相同；这就像舍弃绳墨，主观地去定曲直，放弃权衡用手去揣量轻重一样，即使是再公正精细的人也难免出现差错。”又说：“只要具备中等以上才能的人，都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按照他们才能高低适当加以任用，让他们充分施展各自才能，合力完成一件事情，这与任用一个完人结果无异，只不过这就更需要皇上圣明而宽厚，并且深通用人之道才行。因为谁说了几句漂亮话就认为他才干过人而宠信他，也不管他所说是真是假，因为谁在一件小事上得罪尊上就降罪于他，也不考虑他是否出于忠诚，宠信谁就赋予他无限的权力而不管他是否有担当如此重任的能力，谁违背了尊上就对他重加责罚而不考虑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下去，朝臣百官将不会再有人恪尽职守，君臣之间也就没有什么职分可言了。”德宗

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

没有听从陆贽的话。陆贽还曾上书论证调节赋税制度之事，共谈了六点。第一点是关于两税法的弊病问题，大致是说：“过去实行租庸调制时，全国统一，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法令，依法纳税服役，尽管有人企图逃避国家的义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不容情，所以百姓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这完全是由于严格的制度使然。但是，自从安史之乱发生以来，国土沦丧，国家统一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执政官杨炎自以为知道弊病所在，名为革除旧弊实为废除旧制，想要简化制度却又不得要领，结果以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只不过是让各州把大历年间税率最高的一年的税额固定作为今后两税应交的税额。然而物产财富是靠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历朝历代制定赋税制度，都是以人丁数为征税标准。不因务农便增收其赋税，也不因停止耕种减免其赋税，这样种地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不因家里产业扩大便随意增收赋税，也不因寄居他乡便免除其调赋，这样百姓就愿意定居下来而不再迁移；不因勤劳而加重其兵

役，也不因懒惰而免交代役庸税，这样人们就愿意勤勤恳恳耕种土地了。而两税法的制定，仅以资产为根据，却根本不考虑人口因素，那些想挣钱的人都愿意辗转他乡，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些人既可以挣到钱又可以逃避赋税，而那些辛辛苦苦耕种土地的人却总是不堪赋税的重压。这不正是诱导百姓弃农经商，逼迫百姓逃避兵役吗？再说立法之初，不考虑公正平等，供应有繁简之别，地方能否做到也不一样，各地所担负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派去执行新税法的使臣意见也各不相同，然而政策一经上奏并决定下来，就只会增加，不会减除。加之大历年间，军资、供奉之类全都归入两税，如今这两项却又单列出来，与两税并存，希望对此能够稍加调整和减免，以缓解目前经济困境。”第二点，请求两税以交纳布帛为准，大致是说：“谷物是百姓生产出来的，银钱是官府制造的，正因为如此，前代税制，都是规定租征谷，庸征绢，调征丝绸布匹，哪里有过法律禁止民间铸造钱币却又以银钱来征收赋税的现象呢？而如今实行的两税法，偏偏是以

银钱和谷物两种东西来规定赋税的数额，从而导致官府所征收的东西并不是人们从事的行业所生产的东西，而人们从事的行业所生产的东西又不是官府要征收的东西，于是有的人只好以高价去买他所没有的东西用来交赋税，也有的人为了交税款只好低价卖掉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样一高一低，损失就大了。希望能够对各州刚刚实行两税制度时的丝绸布匹价格进行考察，对比当今市价进行调整，估价低的就予以提高，估价高的就适应压低，然后取其中间价格，折算出应缴纳的税钱，再折合成布帛数，就是应纳的赋税。”第三点，是关于地方官吏以增加户口、增收赋税、开垦荒地为政绩的问题，大致是说：“地方长官很少有人能够具有忠诚宽怀之情，也很少有人能够怀着秉持公正之心。他们大都是以侵占相邻地方的土地为能事，招募聚集流亡在外的人以标榜自己教化有方。离开原来的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会因为是刚刚迁移而被减免赋税。时而来时而走的又会以恢复旧业为名而受到优待。而那些只知安居乐业、坚守故土

的人，服役和赋税却越来越重。应当严格规定政绩标准，如果所管辖的地方富裕殷实，超额完成了赋税定额，可能任其按照户口调整降低各家的赋税，然后以各家各户降低税率的多少来划分政绩等级。其中减免十分之三者为上课，减免十分之二者次之，减免十分之一者再次之。对于人口流亡在外很多，居留原地者只得按户加税的地方官，比较多少，惩罚办法也像前面所述一样分力三等。”第四点，关于纳税期限太紧问题，大致是说：“养蚕刚刚开始，官府已在征收蚕茧税了，庄稼还未收割，官府又已经在征收谷租了。上司要求越严格，下属催租就越横暴，有货的人急于出手于是就宁肯损失一半的价钱，没货的人因急于交租要去借贷也要加倍偿还贷款，希望再认真考虑确定征税期限。”第五点，请求用茶税钱建立义仓以防水旱灾害。第六点，论证兼并土地的人家，私自赋敛比国家征税还重，请求对兼并占领土地进行限制，裁减租价。以上所论都没有被德宗采纳。但陆贽因深感皇帝待自己之厚，但凡政策有不当之处，常常要